

中华文化



书系

● 李均惠
● 李卫宏
● 宋杨 著

凤凰涅槃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中华文化  书系

凤 凰

李均惠
李卫宏 著
宋 杨

涅槃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涅槃: 李均惠等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中华文化人学书系)

ISBN7-5408-3597-4

I. 凤... II. 李... III. 中国-社会-研究-近代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649 号

责任编辑: 孙晓燕

技术编辑: 王 凌

封面制作: 何一兵

责任印制: 吴晓光 杨 军

中华文化人学书系

凤凰涅槃

李均惠等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 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 16 号 邮政编码: 610081)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46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7-5408-3597-4/K·58 定价: 22.8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 (028) 3193012-3093



李卫宏，199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现供职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部。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担任《中国佛学文化丛书》编委、《爱我中华》丛书之“中国历史文化”专辑（5本）的主要作者等。



宋杨，199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现供职于四川省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要从事文献情报收集与研究分析工作，业余时间撰写儿童教育方面作品，如《100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选》、《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我中华》丛书之“近代烽火”、“当代成就”等。

总

序

“人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而中国传统人学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思想家对人自身及其思想、行为的自我认识，它是涉及人的本性、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价值、理想人格等诸方面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以天人观为框架、以道德说教为主要内容、以社会政治为最后归宿的特征相当明显，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民族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学术空前繁荣的诸子竞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期间所产生的种种学术思想，大致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而几乎与此同时，古印度、古西亚、古希腊也发生了类似

的情况。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依据他的说法，这是人类精神大觉醒的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人学就是在这—时期奠基了。

在远古文化的背景上，经过宫廷王官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理性制作（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地“创造性误读”过程），“五经”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定本，并走向民间。

“五经”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实践理性”，先民们开始对外在世界进行系统的、辩证的思考，并以典籍的形式将民族的基本精神加以定型。这几部文化元典以其首创性、广阔性、深邃性成为中华民族垂范永久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春秋战国人学乃至后代人学的基本走向。

由孔子开创的先秦儒家人学，是中国传统人学的主流。

儒家人学的产生，以中原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温床。儒家的人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伦理特征，缺乏思辨色彩，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儒家以“仁”、“礼”等观念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品质、人格、道德、修养等问题，并对人作了初步的界定。在儒家的人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社会性的强调，而且人的这种社会性与伦理道德紧密相关，隐藏在这一表面特征背后的是坚定的价值信念。儒家坚信，亲亲（仁）和尊尊（礼）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人类的必然归宿。而先秦儒家大师孟子的性善论，则把理想人格根植于个体的内心世界，把道德的理想与道德的实践安置在同一层面，因此，孟子的人学思想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量，从而对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儒家立足于现实社会去建立人学理论相反，道家玄想万物，思辨宇宙，洞察人生，他们反对已经异化了的仁义道德，从天道无为演绎出人道无为，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因而贯穿了一条自然主义的路线。道家在对世俗的价值观念作了整体否定之后，回归于道并且把握住这惟一的绝对。他们以为，至德之世不需要圣人，不需要政治，不需要人为的规范秩序，也不需要任何文明的成果，但却最完整地保持了人的自然本性。道家的人学理论虽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它导致的是个人的解脱而不是社会的改造，但这种学说主张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宇宙中去，从而获得永恒的自由。道家这种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自觉探索，拓宽了价值关怀的领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以孔孟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人学理论以及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学派人学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人学的历史主线，它们相互驳难，相互弥补，构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的基本风貌。

秦帝国的建立，使法家压倒了诸子，但法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漠视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鄙夷，决定了它根本无力承担其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重任。秦王朝的短命就是证明。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过董仲舒重新阐释过的儒学成为官方思想。董仲舒人学理论的建构，就是把儒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王权相结合，从而使儒家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操作程式。然而，当儒学被神化发展到相当

程度时，它固有的理想光泽便丧失殆尽，普遍的道德变成了极其虚伪的东西，个体势必重新寻找其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东汉末年伤感文学的出现正是这种寻找的前奏，它预示着魏晋时期人学的再次繁荣。

魏晋士人放浪形骸，任意而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度。魏晋风度的背景是玄学。玄学的主题就是魏晋社会的主题，即人生价值在玄风中的回归。人们由此重新确定生命的价值。玄学注意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玄学家们看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然而，玄学的道家性格，最终使他们的担待意识失去了着落，只留下画地为牢的逍遥。这样，佛教就借机发展起来了。

从历史上看，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在南北朝时就发生了。隋唐时期，儒释道互相渗透，互相排斥，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而佛教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即使在盛唐时期，我们也能够豪迈的文字背后体会到一种对神奇的沉思；即使在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里，我们也不时地发现闪闪的“佛光”。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期，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战胜了宗教迷狂。理学家们把天人整体的本质归结为天理，认为天理就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它既是伦理道德的本质，又是宇宙万物的本质。这样，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就不仅仅是人之必然，而且也是宇宙的必然。面对释道二教把越来越多的人引向消极的个人

解脱，理学家自觉地把个体生命的意义纳入到人类整体命运的视野中考察，表现出远远高于释道二教的关怀精神。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耗尽了它的内部生命力，中国社会正孕育着巨大的变化，表现在思想领域，则出现了反抗思潮和极端情绪，这在李贽的思想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使得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文化的怀疑。王夫之猛烈抨击专制独裁制度，反对压抑情欲，痛斥蒙昧主义，横扫奴化思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启蒙倾向。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石破天惊之作，作者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理想蓝图，他用“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束缚，为争取真正的人的权利而斗争。

鸦片战争之后，窘迫的社会现实促使一些人把目光转向西方，而另一些人则更加迷恋传统。这种激烈的冲突，预示着中国人学正孕育着一场划时代的转变，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这种转变的标志。鲜明地把“立人”（即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置于文化革命的首位，这是鲁迅超过同时代人的远见卓识，也使他成为一面伟大的旗帜。在随后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再生，而中华民族的心灵旅程也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以上就是中国传统人学理论的基本脉络。

目前，中华民族已经迈进 21 世纪。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纪，它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世纪。因此，关注一下中国传统人学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终日为“物质”而奔波的人，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是否丢失了。中国传统人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可能

不对今日之现实产生某种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化过程自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我们以为，了解中国传统人学中的精华，对于今日之国人是有意义的，对于实施“以德治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许多弘扬儒家学说的行为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从家庭到国家，所有层次上的社会危机正在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的意识，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儒家价值，正如启蒙价值一样，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在今日之中国，中国传统人学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1. 追求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在中国历史上的多元人学理论中，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一种精神动力源泉，那就是对尽善尽美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对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追求。尽管各种学派对真善美的理解不同，但将真善美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则并无不同。同时，中国传统人学的各个学派都将真善美视为天道的体现，这样，人类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就实现了与天道的融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2. 具有一种历史主动精神，勇于承担天下之大任。作为中国传统人学主流的儒家学派，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

任，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不言而喻的；墨家学派的四处奔波，也不过是为了“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法家学派虽然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味道，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以及为此勇于献身的精神，也具有一种感人的悲剧意味；至于道家学派，在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抨击中，我们也不难体味到对人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3. 保持个体人格尊严，注重品德修养。中国传统人学虽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并不是不尊重个体人格。对中国传统人学影响深远的“庄子精神”，不过是个体尊严、心灵自由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合成；即使是十分强调人之义务的儒家学派，其对于个体人格尊严的论述也不胜枚举。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人学始终将个体人格的尊严与品德修养结合起来，而且强调这种品德修养应该与为学相一致，与为政相一致。这样，个体的人格尊严与品德修养就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

4. 控制物欲，安贫乐道。对放纵物欲的抨击，始终是中国传统人学的主旋律之一。但是，一般地说，中国传统人学并不是极端地主张消灭物欲，而是强调要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中国传统人学对物欲横流的抨击，往往与对统治者的抨击结合在一起，老庄学派就是这方面的证明。而儒家学派的“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更是向人类指出了较为理想的人生走向。总之，中国传统人学的“安贫乐道”不是强调以贫为荣，而是强调在财富与精神不可兼得时应选择后者，这显然

是一种较为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

可以说，中国传统人学中以上几方面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将永远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本书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李殿元、张绍诚先生审定。

引

言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铜关铁锁，把“天朝上国”的彩色梦幻撕成碎片。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处于第一次“最危险的时候”，面对“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时，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谱写出一曲曲令天地惊、鬼神泣的悲壮旋律。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它既是中华民族以其军事实力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之间的对抗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对抗史，更是觉醒了的中国人与仍然沉睡于“天朝上国”之梦的中国人的对抗史。

诚如当年目睹了鸦片战争始末的马克思

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言：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搅乱了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运行机制，也深深地刺痛了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心。林则徐因为觉醒而成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的首倡者，他与魏源一道喊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然从心理上还把外国人当成“夷”，却无疑是打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的闸门。在这个历史潮流中，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西方接触了关于人权、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学说，却眼睁睁地看着“宣传”这些学说的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一个个反人道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在近代中国史上掀起了一个接一个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轩然大波。而每一次轩然大波，都对民众起到了惊醒并使之逐渐投身其间的作用。

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还是以“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尽管都失败了，但是仍然对拯救民族危亡产生了积极作用，它“打破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要有一个新国家”（容

因《西学东渐记》)。

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跨出国门，置身于欧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商货辐辏的街区以及气宇轩昂的工厂、剧院、斗兽场、法庭、议会之间(有的先进的中国人虽未踏出国门，且不通西文，但却经常置身于各种翻译介绍过来的西书和时论之间)，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乃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动机制的调整与改造，更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意识，尤其是民主意识以及科学文化水平的程度，换言之，要实现资本主义和国家的近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平，实现人的观念的近代化，冲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取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这样，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又形成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一直贯穿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长达三四十年的改良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既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媒体或桥梁，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容上是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次根本否定。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代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摈弃“中体西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改良主义模式，公开宣称用“欧洲思潮”来武装自己。他们仰慕西方文明，主张对其“采取开放态度”，但却反对“全盘照搬”，并通过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

解决大众温饱等弊端的审视，提出民主、民权、民生这三项革命并行的纲领，就孙中山及其伙伴看来，这应当是一个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而制定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纲领。然而不幸的是，尽管孙中山不厌其烦地向中国民众讲解民权、议会、选举，他的纲领并未拯救中国于危难，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宣统皇帝，苦难的中国旧貌未改，它广袤的躯体上依然黑夜如磐，风雨凄凄……

辛亥革命的失败，孕育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代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执著地向着西方寻求真理；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所接过的西方“火种”，不仅要烧掉旧的封建经济结构和制度，而且要烧掉“不适合现代生活”的旧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他们高竖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热烈地呼唤着民主和科学在中华大地上驻足、扎根、开花、结果！一时间，各种新思潮、新社团、新的社会改造方案犹如雨后春笋，此伏彼起，使得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之交的中国大地，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界普遍注目的重大问题。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的中国人，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中国人民逐渐觉醒的历史，是觉醒了的中国队伍不断扩大乃至形成了全民族的觉醒的历史。每一次轩然大波，都是一次民族觉醒的历